

引 言

中国是文明古国，是人类东方文化的发源地。她为华夏儿女提供了永远享受不尽的财富。

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能看见中国文化的具体形象。对此，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会感到骄傲。中国有唐诗宋词、古书古画、中医中药、丝绸茶叶和造纸、印刷、火药、罗盘针等促进近代世界发展的四大发明，还有大屋顶的宫殿、楼台亭榭的园林……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的国粹随手拈来，数不胜数。那么是否凡事都好，都要继承呢？

长久的封建专制使统治阶级走向没落，使古代文明中某些消极因素得以延续，形成对人民，尤其是对女性的野蛮桎梏。

清朝是持续了 20 个世纪的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它虽然也有过“康乾盛世”，但没有消灭封建制度中任

何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弊制陋俗，没有解决历史进步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没有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所以，当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入侵中国时，幅员广大的帝国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腐朽的清政府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洋人”，成为侵略者掠夺与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

不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就不能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促进中国进步的目的，所以，人民革命便成为时代的主题。要革命必须唤起民众，而唤起民众必然从帮助他们摆脱封建束缚入手，所以剪辫子放足就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一呼而亿万人响应。剪辫子放足也是走向近代社会的一大需要。试问：大辫垂垂怎能适应快节奏的近代社会？怎能操纵大机器生产？怎能体现自由与民主，发挥人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再问：缠足妇女走路都吃力，何谈解放两亿妇女劳力？何谈提高民族素质与国力……

伟大的中华民族于近代之初如一头睡狮，当他醒来时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冲破任何网罗，形成了近代社会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现了包括剪辫子放足在内的历史变革。

闭关锁国的封建清王朝

清王朝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历程的最后一个王朝，它不仅完全继承了明朝的衣钵，而且带着鲜明的民族征服的标志。它虽然创造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盛世。但纵观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比这 268 年的统治，它不过是一个封建老人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顺治元年(1644 年)，腐朽的朱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赶下了皇帝宝座，而此时，盘踞在山海关外辽沈地区的满洲贵族早就想入主中原，并且时刻关注着北京的时局，做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准备。它趁农民军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失误，借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之力，一举杀人山海关，以为朱明王朝报君父之仇的名义开进北京城，从此占据了中国的皇帝的宝座，建立了大清王朝。

清王朝几乎全部承袭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和律法，将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巩固统治的理论基础。它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科取士，广泛招揽为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转所需的各方面人才，并设馆编书发展封建文化。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努力，清王朝的统治在传统封建经济与理论上确立且稳固下来，继之而来的是进入了乾隆、嘉庆时期的繁荣阶段。

中国广大的地域，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口，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财富。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使满洲贵族享受着至贵至尊的优越生活。清朝历代君王对此十分满足，只顾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但是清朝毕竟处在近代世界已经开始的时期。早期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不会放过这个庞大的古老王国，必然要向中国寻找资源、劳力和市场。而清朝统治者却无视世界环境，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因为他们害怕外国人会影响天朝大国的秩序，会增强民众的反满情绪和力量。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拒绝同外界联系，紧闭国门，企图隔断中国与外国以外的世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必同外国人互通有无。”^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朝的

^① 《纪英夷入贡》，《熙朝纪政》卷6。

外交与外贸政策一直比较保守。

18 世纪，西方国家的商船乘风破浪纷纷驶入中国海岸，对华贸易要求迫切。但清政府只开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一口通商严重影响了西方商人的利益，因此接连发生涉外贸易案件。乾隆帝不仅亲自过问，而且详细究查，严厉处治，他认为外商滋事必有内奸。在加强对外贸易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内控制。沿海一带人民出洋贸易遭到了种种限制，不许携带违禁物品，还对船只大小、人员多少、出海时间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违者予以严惩。正由于如此严厉控制海外外贸事务，所以造成中国的海上贸易事业萎靡不振。乾隆帝严格限制一口通商，加强通商口岸的管理及从严格控制人民出洋贸易，企图通过尽量减少和避免对外接触来维护国家的独立与自己的统治。他没有把眼界放开，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自以为天朝至大，其封建保守的政策是消极的。这个政策，严重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在乾隆朝起了保护国家独立自主的作用，但在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时代，中国如不从迅速增长国力方面努力，将来的国家独立自主是不可能的，在其晚年就发生了西方对他的欺哄和提出种种侵略要求的挑战事件。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英国国王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勋爵，

率领 700 余人的外交使团，乘五艘大船，携带许多珍贵礼物和国王亲笔信专程来中国。先是广东巡抚郭世勋报，英王遣使来补祝乾隆帝八十寿辰，乾隆帝非常高兴，传旨各地准备优厚接待。各封疆大吏正忙于准备高规格接待时，广东官员又来报，英使来补祝寿辰是广东官员捏饰之词。事实果然与前报相反，马戛尔尼来中国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是整个殖民主义计划中的一部分。此次前来的目的是搜集中国情报和为打开中国市场，带来事先拟定的各种条款，要迫使清政府保证英人获得通商利益，要求于广州之外开设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要求英商留居和储存货物的专属地域，要求给予免税、减税的优待等等。乾隆帝以颁给英国国王敕（chì，音赤）书的形式逐条予以答复和批驳。他虽然捍卫了主权，但仅解决了眼前问题，未作长远安排。更为可笑的是在觐（jìn，音进）见礼节的小事上却大做文章，寸步不让。马戛尔尼欲以朝见英王的礼节，单膝下跪、吻手拜见乾隆帝，而乾隆帝却一定要他行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为礼节一事反复交涉，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工夫，证明乾隆帝对外部世界全然不了解，以大国皇帝自居。他的基本思想代表了清代皇室的一贯态度，保守而又妄自尊大。

闭塞和保守不仅限于清廷的几代皇帝，整个统治阶级除少数人外，面对闯进国门的西方文化都表现了

排斥或拒绝的态度。西方传教士自明代就已涌来中国。据统计，从明万历朝至清顺治朝，翻译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技书籍达 150 余种。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已成为风气。明礼部侍郎徐光启与德国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等，根据西洋之历法改订成新的历书《崇祯历书》，但未来得及颁行于世明朝旋即灭亡。清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刚刚进入紫禁城，汤若望立即上书多尔衮，宣称天主教的宗旨，能劝人忠君主，孝父母，教人贞节廉洁守法，得到多尔衮的信任。同时汤若望请求使用新历法，也得到他的认可。顺治二年正式废除明朝大统历，改用汤若望等编制的新历，称为《时宪历》，汤若望得到清廷信任，授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师”。汤若望的得宠引起一部分保守势力的嫉恨，当然原因不仅在于他个人，而是基于对整个西学。当时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著《辟邪论》，又上《正国体疏》，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和汤若望，指责天主教是“无父无君”、“五伦俱废”的邪教，西方科学是“旁门左道”之学，并且控告汤若望以其“邪说”“惑众谋反”。当时顺治帝不予理睬。顺治十八年（1661 年）顺治帝去世，康熙帝继位，因其只有 8 岁不能直接掌管朝政，朝政暂由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共同管理。康熙三年（1664 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汤若望“邀结天下人心谋叛朝廷，已行迹显露”。于是辅

政大臣们将汤若望逮捕入狱，管理天文历法的专门机构钦天监内大小官员被处死数人，入监、流放和解职又多人，《时宪历》被废止，重新使用明朝大统历。第二年，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正，杨的好友吴明枢为监副。杨又著书，题为《不得已》。书中攻击西学，说“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可见其保守、固执到了何种程度^①。杨氏年轻地位又低，为什么敢如此直接指斥位居国师一般的汤若望，而且取得了成功呢？杨光先的思想代表了士大夫层的许多人。中国知识界和上层社会之所以对西洋之学百般挑剔，甚至打击，将其排斥在中国学术之外，实因传统思想理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长久岁月，可谓根深蒂固，如若没有足可与之对敌的强大力量是不可能改变它的，这是中国近代革命艰难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国学不仅发展的时间长久，而且包括面很广，自成一个完整体系。中国思想理论也称为国学，其传统性与完整性很容易促成思维方式的保守与排外。历法是中国国学的组成部分，是以月亮围绕地球转动的规律编订的，而近代西洋历法是以太阳为中心说建立的。太阳中心说在欧洲经历了生死搏斗才确立起来，它传到中国因与传统国学不符，所以再次经历严峻考验。虽然最终

^① 《杨光先传》、《汤若望传》，《清史稿》卷 272。

在清朝历法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但反映了有清一代从士民到皇帝不想了解外国的保守传统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落后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他们对待西学与洋人及外国事务的态度，中国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决定了中国近代化的速度，所以晚清时期的中国一直处于挨打、受辱的被动局面。

二

垂辮裹足的古老中国人

17 世纪中叶，满族爱新觉罗氏生机勃勃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建立了清王朝。这个王朝的建立等于给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打了一针强心剂，它虽然挽救了垂危的封建制度，但是却留下了明显的民族征服的标记——凡成年男子背后都垂着一条长辮子。为什么要垂辮子，怎样垂下来的辮子，其间经历了极其残酷的斗争。

清代辮发源于满族，满族的先人是女真人（1636 年清太宗皇太极宣布族称改为满族）。女真人以狩猎为业生活在山林之中，由于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决定了他们不同于以农耕为业的汉族的服饰与习俗。为防止在穿越树木之间时被枝条刮扯，他们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粗的一缕，分两股像拧麻绳

一样拧成辫绳垂在后背^①。当时的汉人将女真人称为僧人，因为从正面和两侧都看不见辫子，只有从背后才得见，这是一种歧视女真人的称谓。明末努尔哈赤做了女真首领，率部崛起于今天的抚顺以东地区，带着对明朝的复仇和对汉人的征服心理，向明朝下战书《七大恨》，表明其出征的原因和目的，进而一举占领了辽东的广大地区。他为改变汉人对女真的歧视心理，用屠刀命令所有汉人改变原来束发挽髻的发式，只留脑后少许头发结辫垂下，其余头发全部剃掉。这是清初下达剃发令的开端，也就是说满洲贵族对汉人下达剃发令，不是从顺治元年入关时开始，而是在侵入辽东时开始的。汉人不接受这个命令，于是与他们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金州、复州、海州、盖州采矿的工人们首先揭开了反剃发斗争的序幕，他们聚集在一起向持刀挎箭的八旗军提出不剃发的抗争，并且杀了自己人中少数剃发的懦夫。接着镇江（即今天的丹东地区）、长州等地汉人也先后聚众宣布不剃发，并杀死了努尔哈赤派去的官员。努尔哈赤再次为推行剃发令大开杀戒，在那些地方汉人为保护头发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于是在辽东各地不断发生汉人投毒事件：井水有毒，女真人买的猪、肉、蔬菜中也有毒。有 8 个

① [朝鲜]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汉人在努尔哈赤大吃大喝的时候，向他后院井里投毒，被女真兵发现捉住，送到努尔哈赤面前，努尔哈赤命令他们当场吞掉手中的毒药。这 8 位反抗民族征服的勇士当场毙命。但此事使努尔哈赤非常害怕，传了几道命令，叫他的兵士不买肉，买猪还要等四五天毒散之后再杀了吃；白天要结伙走路，晚上不要出门。据《明经世文编》、《三朝辽事实录》、《李朝实录》等史料记载，当时汉人大批流亡，流向山海关、朝鲜或从大连渡海奔山东。更有清河城、沙岭城（属营口地区）、义州城等，全城军民据城不剃发。努尔哈赤率军攻下这些小小的弹丸之城后，竟将全城的男女老少全部屠杀掉。开原城被攻破后，城中军民纷纷上吊投井，死不剃发。清初的反剃发斗争是在清军没入关前从女真人占领辽东地区时开始的。

李自成率军攻下北京城后，许多人表示归服，但由于对明廷大小官员实行“极左”路线，逼使他们对农民军产生对立情绪，影响到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促使其决定借清兵以报仇。女真人于天聪十年（1636 年）建立清国，并改族称为满族。顺治元年，当听到李自成攻进北京城的消息后，多尔袞立即起兵想从北部长城进入中原。行军中途遇吴三桂派遣的特使，于是他们往来谈判达成协议，吴三桂便于此时剃发引清兵入关，当时吴三桂的兵还没剃发。李自成亲率大

军征剿吴三桂，遭到吴三桂与清军合击，在山海关兵败后撤出北京城向西安退去。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员们听传说清兵帮助报君父之仇，抬着轿开城门迎接多尔衮和滚滚而来的清兵。事实上这是个骗局，清兵借“帮助复君父之仇”之名，夺得了农民军推翻明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果实。清人登上皇帝宝座，本相暴露，于是全国规模的剃发与反剃发斗争开始了。清廷的剃发令是严峻的，凡令到限三日内不分官民都要剃发，违令者斩。“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令遭到了汉人的普遍反抗，一幕又一幕重演着辽东地区汉人反抗野蛮征服的英勇悲壮的斗争场面——“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人八十万死义”等等。本来李自成农民军余部以为完成了推翻明朝的使命，归降清朝，但因反对剃发令，所以降而又叛，直至康熙初年全部覆没，坚持抗清斗争 20 余年。驱逐荷兰殖民军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也因反对剃发而迟迟不肯归降清朝。

不论汉人怎样反对，满洲贵族用屠刀杀遍全国，推行剃发令，完全改变了全国男性的发式，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头顶一小撮，结辮下垂，当时称为金钱鼠尾式。由于剃发的人多了，就兴起了一个行业——剃头业。匠人们肩担一担，前后装着剃头用具，而且在担子前面竖一根细长的竿子，警示人们，不剃头就要被砍头系上高竿示众。

剃头成为清朝的基本政策，剃头成为顺民的标志。谁不剃头谁就是十恶不赦的叛逆，而叛逆一旦剃头立即成为顺民。如此严酷的剃发令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不必看肤色，不必听语言，也不必分贫富、高低和贵贱。只见剃掉大部分头发背后留一条细辫子的男子必为中国人。但是美在每个人心里，它无时无刻不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200 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半拉瓢”式^①。

男人必须剃发，女人的境遇如何呢？她们被封建伦理与制度束缚得更紧，压迫得更深。封建伦理中的“三纲”和“三从四德”将妇女一生的地位和行为规范都确定下来。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妻子在丈夫面前，就像臣子在君王面前一样，儿子在父亲面前一样，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尊卑之别，只能尊从而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是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封建礼教歧视和压迫妇女，“三从”补充了妇女一生对男性依从的内容，“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一生都依附于男性，不能独立。她们平时该怎样做呢，“四德”规定得很全面，即“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妇德”即指屈从男权，并要在

^①王冬芳：《辫发风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日常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中表现出来。对此，我们在反映古代题材的作品中常见到“卑妾”、“奴身”、“妾身”的自我称呼，和妻子侍奉丈夫进餐时跪在丈夫面前双手托盘举过眼帘——“举案齐眉”的形象。妇女的容貌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卑恭柔顺的样子，这就是“妇容”。“妇言”，即不能随意说话，如果说也要卑言柔声。“妇功”即指妇女的手艺，没有别的只有织丝、纺线织布、编麻和刺绣之类。总而言之，“四德”确立了妇女在品德、语言、容貌态度和手艺各方面的规范，令妇女们谨慎遵守。

最体现对妇女限制和摧残的是封建时代所标榜的“节烈”观。在这个观念下，节妇烈女是无数女性同胞中最不幸的人，她们用血泪和生命熔铸了节和烈的形象。在浩瀚的《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篇章书写着男性方方面面的活动，而轮到女性，只在每部史书后面列有节烈妇女传。统治者们推崇节妇烈女，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整体秩序，维护统治者的地位，所谓“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再从两性关系言之，所谓节和烈，其目的都是从维护男性利益出发，维护男性对妇女的专有权，即妇女终生只属于一个男人。节和烈形式不尽相同，实质一样。节，多对寡妇而言。烈，是指妇女“殉夫”、“殉情”，做无谓的牺牲。在封建国家中节烈妇女的产生是各地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

是考核官员政绩的内容之一。每年由官员上报节烈名单，由中央礼部批准。如果一个家庭出现一位被官方命名的节妇或烈女，那么这个家庭的地位便会立刻提高。所以有的为富不仁的豪门，为病人膏肓即将死去的儿子买娶贫家少女为妻，不日间病人故去，家长立逼贫家少女悬梁自尽，以换取节烈人家的美名。清王朝在标榜节烈方面尤为重视，节烈妇女队伍也就庞大起来。封建社会对妇女提出的“三纲”、“三从四德”或“节烈”等规范和要求，不外乎要求妇女守住贞操，“贞操节烈”就是封建中国女性的特别之处。

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已经被封建伦理、制度、习俗束缚得紧紧的了，但还没有完结，还出现了裹脚（也称缠足）的现象。为什么要裹脚呢？《女儿经》中写道：“为什么事缠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怕她轻易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清苑诗谣》还说：“裹上脚，裹上脚，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圈。”可见裹脚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强调妇德，用行动不便来实现“别内外”，使妇女只能在家中养育儿女操持家务，这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手段。当然，也有人否认这一点，认为缠足更能表现女性柔弱的美，对此只能解释为“美”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思想观念中的标准不同而已。为防范天生活泼的女孩子跑出家门，为将美丽可爱的少女锁在闺房之中，标榜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不知是谁发明了裹脚的方法，使妇女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快，其迈不开脚步，姿势笨拙、艰难之状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妇女缠足是世界历史上仅有的怪现象。起于何时呢？有几种说法，较为有说服力的是起于南唐说。据陈东原考证南唐末世李后主沉迷于奢糜浮华的宫廷生活，他有个宫嫔叫窈娘，体态纤丽，善于舞蹈。于是李后主命人造一座高 6 尺的金莲台，装饰上珍宝和网带缨络，中间作品色瑞莲，令窈娘用帛缠足，在瑞莲上屈身作新月状，穿素袜在莲中舞蹈，回旋有凌云之态，这就是后世女子缠足之始。到了宋代，人们都以脚小好看，盛行缠裹了。以此见之，这初始缠足的意义同后来却全然不同。

据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南宋时缠足已在社会上斐然成风。至元末明初已为社会所崇尚。缠足之所以能够盛行而相沿成俗，无疑是宋代形成的理学从精神上对女性加强禁锢的直接后果。明洪武朝南京街头出现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光着脚的妇女怀抱着大西瓜。洪武皇帝看见了非常生气，寻找作画人，没有找到，就把一街人都杀了。原因是这幅画讽刺了他的马皇后，怀抱西瓜示意怀西，马皇后是淮西人，赤足表示她脚大，讽刺她的大脚。整幅画的意思是大脚的淮西妇不足以母仪天下。这个故事反映了在